

評分參考及參考答案

(a) 就資料 A 所示，指出香港政治於 1990 年代的兩項轉變。 (4 分)

評分參考

- L1 僅能指出一項轉變，或者能指出兩項轉變但未能恰當地運用資料。 [最多 2 分]
- L2 指出兩項轉變，並能恰當地運用資料。 [最多 4 分]

例： - 香港首長由英國政府委任轉變至由推委會選出。
- 立法局(臨時立法會)的選民人數大減。

參考答案

其一，香港首長的產生方式出現轉變。在 1997 年前，港督由「英國政府委任」，但至 1997 年回歸後，行政長官由「商界人士為主的四百人推委會選出」，可見香港首長的產生方式由委任制改變為選舉制。

其二，立法局的選舉方式也出現了改變。1995 年時的立法局選舉，選民人數眾多，「香港的選民一共投了 138 萬多張選票」，但至 1997 年的臨時立法會選舉「卻是由 400 名推委選出」，可見選民人數大減，由普遍性的選舉方式轉變為小圈子的選舉方式。

(b) 參考資料 A 及 B，比較鄭宇碩及錢其琛兩人對臨時立法會所持的看法。

(4 分)

評分參考

- L1 嘗試作出比較，唯參考資料作出解釋時有所含混。 [最多 2 分]
L2 能夠作出有效比較，並能參考資料作出有效解釋。 [最多 4 分]

相異：

例： - 鄭宇碩認為臨時立法會的代表性和認受性很低，但錢其琛則認為臨時立法會將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，而且得到香港各階層及界別的支持。

- * 考生一般會認為兩項資料看法不同。然而，考生若持其他觀點而又言之成理者，應酌量給分。

參考答案

鄭宇碩及錢其琛兩人對臨時立法會的看法截然不同。

就臨立會的代表性而言，鄭宇碩認為臨立會代表性很低，只是「由 400 名推委選出」，更形容是香港政治的「一大倒退」，反映其認為臨立會的人民代表性不足。

然而，錢其琛卻認為臨立會將會有「廣泛的代表性」，能夠「體現出社會各階層、各方面的均衡參與」，反映其認為即將成立的臨立會將會有高的人民代表性，與鄭宇碩的意見不一。

就臨立會的認受性而言，鄭宇碩認為臨立會的認受性很低，其指出「26 名民主派九五立法局議員拒絕參加臨時立法會」，反映臨立會得不到時任立法局議員的支持，認受性很低。

然而，錢其琛卻認為臨立會的認受性很高，其指「參選人來自香港各個階層、各個界別和各個方面，其中有不少是現任的立法局議員」，認為臨立會是得到社會各階級的支持，擁有很高的認受性。

(c) 就塑造 1990 年代香港政治發展而言，你認為中國還是英國更具影響力？參考資料 A 及 B，並就你所知，解釋你的答案。 (7 分)

評分參考

- L1 答案含混，未能有效使用資料及個人所知。 [最多 2 分]
 L2 答案缺乏均衡，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個人所知，及/或僅討論中國或英國，或比較中國及英國後未能清楚提出個人看法。 [最多 4 分]
 L3 答案有力且均衡，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。 [最多 7 分]

中國：

- 例： - 行政長官和臨時立法會均受到中國的影響。(資料 A)
 - 中國成立臨時立法會來取締原有的立法局。(資料 B)
 - 六四事件使民主派在 1991 年立法局選舉中大勝。(就我所知)
 - 受到中國支持，建制派在 1990 年代中後期發展蓬勃。(就我所知)

英國：

- 例： - 港督在回歸前是由英國所委任。(資料 A)
 - 英國的政改方案促使中方成立臨時立法會。(資料 B)
 - 彭定康於 1992 年的政改方案大幅改革立法局。(就我所知)
 - 英國於 1990 年代推動了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。(就我所知)

參考答案

中國較英國更具影響力。

資料 A 所示，1997 年後的行政長官和臨時立法會均是由 400 人所組成的推委會所選出，但所有推委都是「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任的」籌委會委任的。換言之，行政長官和臨時立法會議員完全受中國影響底下所選出，中國具有主宰性的影響力。

資料 B 所示，中國認為英國的政改方案「破壞了直通車安排」，結果中方成立臨時立法會，並打算於 1997 年回歸後取締原有的立法局，可見中國的舉動能夠使 1995 年原有的立法局被取締，而 1997 年的臨時立法會更是在中國安排下所成立，故中國具有極大的影響力。

就我所知，中國因素影響了 1991 年的立法局選舉。由於受到 1989 年六四運動影響，港人深恐香港回歸後會受到中國的專制統治，故紛紛支持民主派人士，結果導致 1991 年的立法局 18 位直選議員中有 14 位是民主派人士，可見中國因素是促使民主派在 1990 年代初發展興盛的要因。

而且，中國因素也直接影響了政黨的發展。因民建聯及工聯會等建制派獲得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，在中國 1996 年籌組的「臨時立法會」中，建制派便佔了大多數，更成為了首屆回歸後的立法局議員，可見中國是促使建制派在港蓬勃發展的要因。

英國對於 1990 年代香港政治也有影響力。

就資料 A 所示，在 1997 年回歸前，英國委任港督時「從來未有諮詢過香港人的意見」，反映英國在 1997 年前對於港督的委任有著極大的影響力。

資料 B 也指出「英方單方面推行所謂政改方案」破壞了原有的立法局直通車安排，結果才驅使中方成立臨時立法局，故英國的改革對於香港政治發展也極具影響。

就我所知，英國政府於 1990 年代提高華人對於香港政治的參與，例如於 1993 年和 1995 年委任陳方安生和曾蔭權作為布政司及財政司，使華人能夠晉身司級官員。

然而，相比之下，中國的影響力大於英國。

就我所知，英國於 1990 年代改革立法局是基於中國要求英國交還香港，於 1984 年簽訂了「中英聯合聲明」，結果令英國希望香港在回歸中國前能夠加強民主成份，因此才於 1990 年代改革立法局。可見，中國的影響力大於英國。

而且，英國於 1990 年代委任陳方安生和曾蔭權作出司級公務員，也是基於中國於 1984 年與英國簽訂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確立了「港人治港」的原則，逐步讓港人接管香港事務。可見，中國因素才是根本性因素。

總括而言，中國的影響力大於英國。